

# 朱子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在东亚的普遍意义

[日]吾妻重二

(关西大学 文学部,日本 大阪)

---

**摘要:**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作为东亚普遍知识形态的朱子学,它的成立被誉为“东亚的世界史性事件”。朱子学之所以会在东亚世界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其所揭示的普遍主义。东亚书院或学塾的发达,与朱子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学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而且在礼仪的层面上,依然存活于今天的东亚世界之中。

**关键词:**朱子学;知识体系;东亚;格物致知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1-0011-06

---

朱熹(1130—1200),号晦庵,后世尊称为“朱子”。其学派传承的系谱为: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他一生为官不满十年,其中大部分还是地方官,晚年在中央的任职也不过40来天而已。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建阳讲学、著书,作为民间的学者度过了一生的主要时光。朱子的代表作为《四书集注》,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日本等近世东亚世界,作为知识人的必读之书而广泛流传。此外,他的著作还有《四书或问》《周易本义》《书集传》《诗集传》《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太极图说解》《西铭解》《近思录》等。朱子还有《文集》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以及与弟子的问答记录《朱子语类》140卷。留下讨论范围如此之广而学术水平如此之高的言说,在中国应是绝无仅有的。朱子学不仅影响了他身后800多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成为东亚世界普遍的知识形态。东亚书院或学塾的发达,与朱子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朱子学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而且在礼仪的层面上依然存活于今天的东亚世界之中。

## 一、致广大、尽精微的知识体系

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人类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

### (一) *Philosophia*、格物穷理与存在论

我们常用的“朱子学”一词,它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在此可以想起的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将西学介绍给中国之时,将 *Philosophia* 翻译成“格物穷理”之学。当然,这里的 *Philosophia* 与今天所说的“哲学”比起来,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学科领域,它由逻辑学(*logica*)、物理学(自

---

收稿日期:2014-11-02

作者简介:吾妻重二,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然学 physica)、形而上学抑或存在论(metaphysica)、数学(mathematica)及伦理学(ethica)之五门学科组成。将其翻译成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一词,确实是恰当的翻译。在那个时候,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比这个词更好的汉译词。因为除了逻辑学以外,这几门学科都为朱子学的体系所具备。显而易见,西方中近世的 Philosophia 与朱子学都是重视“理智”的综合性学问体系,<sup>[1]</sup>Philosophia 原是爱“知”的意思,与“格物致知”意思有所沟通。但是,如果按照以上的学科分类来说,则迄今为止,朱子学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领域,也就是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哲学侧面的分析。当然,朱子的学问具备了在他之前中国思想所没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因此无疑应该重视哲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充分理解朱子学。

在朱子学的存在论(本体论)中,首先需要提及的著作是周敦颐的《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此《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并非起源于道教或者佛教,而应该看作周敦颐自己的创作。此篇著作中有一些来自道教的影响是可以承认的,但只不过是一部分。也就是说,《太极图说》的创作,意味着到了宋代儒教就出现了新的存在论。《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就用前所未有的形式,简洁明了地展示了宇宙生成的构造及宇宙中人的位置。它随后受到朱子的注意,成为构成朱子学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它在南宋以后还反过来对近世道教和佛教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存在论拉开了新的序幕。

其次,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注目“理气论”,尤其是“理”的概念。作为道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思想的理论性框架即是理气论。在朱子庞大的哲学体系中,“理”与“气”是说明包含人类在内万物全体之形貌的概念而构成存在论的基本架构。根据朱子的定义,理是使物成为物的形而上的抽象原理,相对于此,气则是型塑物的形而下的材料。朱子在《答黄道夫》中如是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在这里,朱子明确指出,所有的人与物也就是万物都具有理与气,而作为形而上原理的“理”成为存在物的性——本质,形而下的“气”则是制造存在物的道具——材料。气也许应该说是流动的能量,存在物的性质,则如“气积为质”(《朱子语类》卷一)所言一般,不外是由气所凝聚者,因此一切存在都依理与气而成立。如此理与气被视为“分际甚明”的不同层次的概念,这是朱子的哲学被认为是理气二元论的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追溯“理”的用例,就会发现其渊源并不在佛教的华严宗那里,而是在王弼、郭象和皇侃等六朝玄学家们那里,这是从六朝玄学中“理”的定义方法可以知道的。不过,在此我们不能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因为,六朝玄学中的“理”几乎是“运命”的同义词,是取自人生论、追求人生达观的消极概念。如果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既无法推出客观地说明存在的构造这一观点,也无法推出事物应当如此的理想这一积极观点。朱子学“理”的思想有了六朝玄学所没有的特色,由此构筑所谓的理气二元论——过去未曾有过的体系性存在论。

## (二) 平等的人类观与“圣人可学论”

关于人的看法即人类观,令人注意的是强调人皆可以凭借学问而得以成为圣人的“圣人可学论”。这不仅是朱子所主张的,而且也是道学家的一般特征。其实,从汉代到唐代,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是“性三品说”,即使是被称为道学先驱的韩愈也不能例外。性三品说的特色在于:人本来有上中下三个等级。正是由于这样差别对待的人类观,所以在那个时代也就完全看不到圣人可学论了。历经从汉代到唐代的漫长时间,圣人与一般人隔绝开来而被描述成“超人”性的存在。

但是,宋代的道学家们,复活了人皆有善性这一孟子的思想,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理论上的再定义,由此克服了重视差异对待的人类观。这种平等主义的人类观被揭示出来以后,圣人这一目标就得以向万人(除了女性)开放了。这应该说是具有近世这一时代特色的人类观。而这样的新人类观,随后导出了明代王守仁“满街都是圣人”之大胆言论。

朱子学也是士大夫(士人)的学问。士大夫或士人是被期待通过科举而成为指导社会的阶层,而将这一期待最明显地揭示出来的是“修己治人”的理念。出现在《大学章句》序中的这一句话,将朱子学作为士大夫的学问这一性格鲜明地反映出来。“修己治人”就是指学问、人格的陶冶以及政治、社会上实践的结合,这一要求的确符合士大夫所担负的国家社会指导者的期待。“修己治人”这一要求,在《大学》中还以“八条目”的形式表达出来。“八条目”也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从格物到修身相当于“修己”,从齐家到平天下则相当于“治人”。而在“修己”即学问修养论中,极受重视的是“格物致知”的阶段。

朱子将“格物致知”等同于《易》说卦传的“穷理”,作为穷尽事物之理的认识论来解释“格物致知”。这一认识论涵盖了对于外在事物之向外性认识与内在化的向内性认识两个层面,这一认识的双重性构成了朱子在此问题上的独特见解。这种将外与内、表层与深层、客观与主观均收入视野之内的认识方法,一方面对外在世界进行冷静的理智分析,另一方面又成为作为关乎人格陶冶、内在境界的自我修养。这种两方面的追求,便可相称士大夫应有的状态。我们认为,朱子在理智与体验这两个面向,赋予了在中国传统上笼统地被含有的方法更明确的形式。朱子的穷理说在中国的学问史或认识论史上,都是非常有趣的例子。

这样的认识论,在思想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对于事物进行理智性的客观认识这一侧面,产生了朱子的博学与实证学,亦以明确的方式说明世界构造的象数易学等。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也不能忽视,从南宋到清代的各种各样的实证学问——文献考证学、博物学、文字学、自然学、天文学、律历学、数学、医学、本草学和产业技术等,都是与朱子穷理说所具有的理智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在清末,作为西方近代科学 science 的汉译广泛使用“格致”一词,其根源也正在于此。迄今为止,在一般印象中,朱子学与科学没有关系,甚至于认为朱子学是阻碍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耶稣会士与受其影响的中国学者在全面沿用朱子学格物穷理的框架的同时,又将当时的实证科学统称为“格物穷理(格物致知、格致)”,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理所当然的。朱子学还起到了容纳西方实证科学的作用。其次,穷理包含的内在主观的方面,为后世的王阳明所继承,借由阳明心学而结出果实。在朱子那里保持着的对外认识与对内了解这两面的调和关系,到后来出现了分化,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问谱系——清朝考据学与阳明心学。如此看来,朱子的学问论无疑地成为中国近世广泛的学问思想的重要母胎。

### (三)教育论及其实践

朱子对于教育极为热心。这里不仅有提高自己的希望,还有提高他人的积极意志。正如《大学》开头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新民”二字正反映了这种精神。程颐和朱子将《大学》原本的“亲民”改为“新民”,鲜明地显示出变革他人的观点,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

关于“新民”,朱子做了这样的注释:“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章句》)也就是说,充分发挥和实现了自我可能性的人,应该承担起改变他人的积弊、引导其自我革新的实务。正因为如此,朱子十分热衷于教育、讲学。

作为教学的课程,有“大学”与“小学”之分。据《大学章句》序,人到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小学阶段要按规定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及礼仪、读写和算术等基础课程,在大学则要掌握相对高深的理论,进行自我修养,并考察了解社会、政治。这就是从“日常礼貌上的教养、训练”到“理论与社会行动”的提升过程。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也有规定:小学阶段使用新编撰的《小学》,大学阶段则是四书与五经。朱子的教育对象并不局限于特权阶层,而是扩展到了庶民阶层。这是上述朱子学人类观的必然结果,如《大学章句》序所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阶段,不仅王公的子弟,而且“庶人之子弟”也能入学,大学也让“凡民之俊秀”者皆得以入学。这种不限于身份或特权而明确主张普遍性的教育思想,在中世的中国是不曾出现的。倘若我们将适用于所有人的构思称之为“解放”,则朱子所倡导的就是“教育的解放”吧。

另一项不能忽略的是有关礼仪的教育、研究与实践。原本礼仪就是儒教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朱子有关礼仪的研究与实践不仅包含了回归古代儒教的意图,而且也带有对佛教、道教的丧祭礼流行的批判。不过,朱子认识到全面复兴古礼乃是不可能的,而应该对古礼加以取舍,因时宜制定新的礼仪方式。朱子还亲自重新修订了祭祀孔子的“释奠”礼,并复原古代儒服的“深衣”等。

作为有关礼仪实践的著作,《家礼》十分重要,此书是儒教“冠昏丧祭”之礼的简便手册。朱子要使得士人以及一般庶民也能实行儒礼。《家礼》一书,清代以来被认为是冠以朱子之名的“伪作”,但根据近年的研究,可以认定该书虽是未完成之作,但确属朱子本人自作。此外,朱子晚年编纂了《仪礼经传通解》,是以《仪礼》为中心,将《周礼》《礼记》、经书等古代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有关礼的记述,依次分类整理,并加以注释,可谓浩瀚的古代礼制研究大全。该书意在于为后世的儒教礼仪研究提供一部可资利用的材料,对于清代的仪礼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二、作为东亚普遍知识形态的朱子学

### (一) 理的遍在与东亚

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将朱子学的成立称为“东亚的世界史性事件”。<sup>[2]</sup>的确,朱子学极大地影响了近世东亚地域的思想与文化。那么,为什么朱子学会在东亚世界广泛传播呢?这个问题非常之大,而其中的理由之一,就在于朱子学所揭示的普遍主义。

朱子学原本就确信理的遍在。继承了孟子性善说的朱子学,认为理(仁义礼智信)是所有人都具备的,由此超越由家世、身份等外在条件所带来的差别,而强调每个人都具备向上的可能性。如前所论,人皆可以凭借学问而得以成为圣人,这样的“圣人可学论”也是根据理的遍在这一原则而提出的。这一主张蕴含着无论在哪些个地方理都客观存在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参看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儒者藤原惺窝(1561—1619)的发言。他满怀热情地对弟子林罗山(1583—1657)说道:“理之在也,如天之无不峙,似地之无不载。此邦亦然,朝鲜亦然,安南亦然,中国亦然。东海之东,西海之西,此言合,此理同也。南北亦若然。是岂非至公、至大、至正、至明哉。若有私之者,我不信也。”<sup>[3]</sup>也就是说,理遍在于天地之间,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安南(越南)、中国,甚至于其他海外尚不可知的国家,理一定是共通存在的。

进一步地,惺窝在这一遍在之理的思想基础上,认为不仅在本国人之间,而且与外国人之间也可以建立信赖关系。关于这一点,当时吉田素庵(有名的商人角仓了以之子)派遣特许船(“朱印船”)前往安南时,惺窝在代他写的《舟中规约》中写道:“异域之于我国,风俗言语虽异,其天赋之理,未尝不同。忘其同,怪其异,莫少欺诈骗骂。……若见他仁人君子,则如父师敬之,以问其国禁讳,而从其国之风教。”<sup>[4]</sup>这个发言非常大胆,指出不管风俗言语如何不同的国家,人所具有的“天赋之理”都是相同的。他还说:如果在别国见到“仁人君子”,则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父师”一样尊敬之,这也是基于对人性之普遍性的信赖而指出的。<sup>①</sup>

<sup>①</sup> 朱子曾说:“到得夷狄,便在人与禽兽之间,所以终难改。”(《朱子语类》卷四)惺窝对外国的理解可说是将此朱子的看法推进了一步。

在代德川家康所写的致安南国书中，惺窝这样说：“夫信者，吾人性中之固有，而感乎天地，贯乎金石，无以不通。岂啻交邻通好而已哉。虽是千里不同其风也，所以五方皆不殊，此性者也。由是见之，则其不同者，特衣服言语之末而已。然则千里万里虽远，衣服言语虽殊，有其不远者不殊者而存。是以所谓一信也。”<sup>[5]</sup>据此，信（信义）是人“性”中固有之物，众人无不相通。正因为如此，无论国情、衣服、言语如何不同，同具此“性”这一点上人都是相同的。“性”指的是人的本质，在朱子学中则等同于“理”。简单来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生来具备人之本质的理（仁义礼智信），由此便可以构筑起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基于朱子学的理的普遍性，惺窝主张平等的人类观。向来不太受人注意、致力于与朝鲜开展外交活动的雨森芳洲（1668—1755）的思想，可以说是由惺窝的这种朱子学人类观所推导出来的。

如此看来，朱子学在近世东亚被广泛接受的理由，不仅在于朱子文章的明晰性——书面语言的“古文”，当时盛行于东亚，而朱子写出来的文章正是这一文体的卓越代表，而借这种明晰的语言所表达的理的普遍主义思想，是容易想象的。朱子学正是这样一个谁都能学习、谁都能够接受的结构。而且，如前所述，这种思想还有助于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作为同样的人，一定能够理解、沟通”——以这种哲学为内核，只要坚持儒家的修养和礼仪，就能构筑起相互之间的理解关系。这样说，不免有种远离现实的迂阔之感，但倘若与那些主张人之不平等、肆意煽动人与人的不信任的思想（如“性三品说”与《韩非子》的思想等）比起来，朱子学的积极意义就会容易明白了。

## （二）书院与教育

在近世东亚，被称为“书院”或“学塾”的民间教育机构非常发达，无论中国、朝鲜、越南还是日本，莫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院或学塾的发达，与朱子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自身就批判科举与官立学校，而以民间书院为据点进行讲学。在致力于自我修养并以成圣为最终目标的朱子看来，以出人头地为目的而准备考试的“举业”，是毫无意义的。他对国立大学的太学评论道：“太学真个无益，于国家教化之意何在？”（《朱子语类》卷109）目睹官立学校的颓废不振，朱子所寄予期望而努力推进的，正是书院的讲学：“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衡州石鼓书院记》，《朱文公文集》卷79）这是朱子为友人修复衡州（今湖南省）石鼓书院时所写的文章中的话。正如这里所说的，朱子自身也建立“精舍”亦即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此外，他还积极复兴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书院。众所周知，朱子挂于白鹿洞书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中国、朝鲜与日本的学塾中作为讲学的指导方针而被广泛采用。

此外，日本的贝原益轩（1630—1714）在他的《和俗童子训》中这样说道：“凡人者皆稟天地之德，其心生而具仁义礼智信之五性、因而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道行焉。是乃人尊贵于万物之处。以此云：人者万物之灵。灵者，谓其有高于万物的聪明之智也。然而若唯饱食、煖衣、安居而无人伦之教，则不知人道，又且近於禽兽而失所以万物之灵之验。古者圣人忧此，而立师，为学校，天下之人，自幼教之以道，则人道立而方得免于近禽兽之事。”<sup>[6]</sup>益轩基于朱子学的平等人类观，强调教育对于人无比重要的。《和俗童子训》作为儿童教育之书，在江户时代成为一本畅销书，获得了很多读者。此书是日本“较有系统的第一部教育论书”，<sup>[7]</sup>影响很大。由此可知，作为“普遍”的朱子学之人类观与教育思想，在江户时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日本人知识的进步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 （三）礼仪与《家礼》

礼仪象征着文明，明代的丘浚在《文公家礼仪节》序开篇提到：“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礼其可一日无乎。成周以礼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家，莫不有其礼。”这也就是说，日常的礼仪实践，可将中国与夷狄、人类与禽兽区

别开来。换句话说,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志,就在于礼仪的有无。

礼仪象征文明这一思想,在以往的东亚地域广泛流传。现在韩国首尔留存的南大门的正式名称是“崇礼门”,琉球(冲绳)首里城的正门有“守礼之邦”的匾额,这些都象征、体现了这种思想。首尔南大门之所以叫作“崇礼门”,是在五行思想的方针下,以仁义礼智和东西南北四方配对,而南方正好是礼的方向。这些名称意味着无论是朝鲜还是琉球,都以此向国内外的人们明确宣示,自己并不是野蛮的“夷狄”,而是拥有着礼或“文明”的先进国家。在以中国为文化中心的东亚地域,儒教礼仪也成为国家文化地位的重要象征。

上面提到的贝原益轩,还曾这样说道:“礼者天地之常,人之仪则也。则谓人之规矩也。无礼,则无人间之规矩,而同于禽兽。因此应自幼即谨守礼仪。人之行为,事事应有礼。若万事有礼,则有条理而易行,心亦定而安。若无礼,则条理差失,紊乱而不行,心亦不安。故礼乃不可不行者也。自小儿之时,即应当遵从和礼之法而教之起居动作、饮食、酒茶之礼仪、拜礼等。”<sup>[8]</sup>

如此看来,将礼仪看作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之区别所在的思想,在东亚是十分普及的。在日本,《家礼》的影响并不像在上述国家里那么强烈,但是实际上江户时代的儒者们还是撰写了大量有关《家礼》的著作,对这些著作今后我们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原来,“冠昏丧祭”这一日语的常用词本身,就不外乎是从《家礼》中来的;日本人祭祀祖先的牌位,其形式也应是源自《家礼》。在近世东亚世界,《家礼》似乎成为极大地改变人们生死观与祖先祭祀方式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朱子学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而且在礼仪的层面上,依然存活于今天的东亚世界之中。

(傅锡洪 译,吾妻重二 修订)

#### 注释:

[1] 吾妻重二:《格物窮理のゆくえ》,《朱子学の新研究》,東京:創文社,2004年。

[2] 島田虔次:《朱子學と陽明學》,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77頁。

[3] 太田兵三郎、小糸夏治郎編纂:《惺窩問答》,《藤原惺窩集》下冊,京都:思文閣出版覆刻,1978年,第394頁;石田一良、金穀治校注:《藤原惺窩·林羅山》(日本思想大系28),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202頁。

[4] 太田兵三郎、小糸夏治郎編纂:《舟中規約》,《惺窩先生文集》卷9,《藤原惺窩集》上冊,第126頁;石田一良、金穀治校注:《藤原惺窩·林羅山》,第89頁。

[5] 太田兵三郎、小糸夏治郎編纂:《致書安南國》,《惺窩先生文集》卷9,《藤原惺窩集》上冊,第125頁;石田一良、金穀治校注:《藤原惺窩·林羅山》,第88頁。

[6][7][8] 貝原益軒著、石川謙校訂:《養生訓·和俗童子訓》,東京:岩波書店,1961年,第206、295、295頁。

[责任编辑:蔡永明]

## Zhuism: Its System of Knowledge and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East Asia

Agatsuma Re-2

(Literature Department, Kansai University, Japan Osaka)

**Abstract:** Zhuism is an enormous system of knowledge. We should not study it only in the realm of Chinese philosophy, but also in the realm of history of education, etiquette and even in human cultural history to understand Zhuism. As the common knowledge form of east Asia, Zhuism's establishment is praised as "a world historic event in east Asia". The reason why Zhuism have spread so widely in the eastern Asian world is that Zhuism reveals universalism. The prosperity of academy or old-style private schools in East Asia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Zhuism. Zhuism survives not only in the ideological level, but also in the etiquette aspect in today's world of east Asia.

**Key Words:** Zhuism, system of knowledge, east Asia, from object-observing toknowledge